

[DOI] 10.19653/j.cnki.dbcjdxsb.2024.01.003

[引用格式] 宋玉茹, 刘诚. 数字营商环境、智慧法院与服务消费[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4(1):24-36.

# 数字营商环境、智慧法院与服务消费

宋玉茹, 刘 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6)

**摘 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提振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了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影响, 并进一步引入智慧法院建设, 作为数字营商环境影响服务消费的一个具体机制。研究表明, 提升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会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 并且智慧法院建设会在数字营商环境对服务消费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作用。由此,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不仅是整体营商环境提升的必经之路, 也是拉动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路径。本文相关结论对中国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快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数字营商环境; 智慧法院; 服务消费

**中图分类号:** F20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4)01-0024-13

## 一、引 言

“水深则鱼悦, 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软实力的指标, 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 “应当立足内需, 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sup>[1]</sup>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中跃居第31位, 在190个参评的国家和地区中, 比前一年提升了15个位次。2023年4月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最新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显示, 中国营商环境的排名为第50位, 投资前景的国际认可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传统营商环境向数字化领域的延伸衍生出“数字营商环境”这一重要的新兴概念, 数字营商环境是经济全球化、数字化不断加深的必然产物, 其既涉及对传统营商环境在数字技术方面的改造提升, 也涵盖了面向和适应数字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新型营商

收稿日期: 2023-12-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平台经济的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23BJY059)

作者简介: 宋玉茹(1996-), 女, 山东郓城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金融周期、数字经济研究。E-mail: 1736528231@qq.com

刘 诚(通讯作者)(1985-), 男, 山东广饶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制度经济、数字经济研究。E-mail: liucheng1353@163.com

环境<sup>[2]</sup>。2022年2月,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进一步赋予了营造数字营商环境的准确要求,也为建设与优化中国数字营商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

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同样是建设现代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而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不仅仅意味着传统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为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发展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并且就“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作出深刻阐释。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应当“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并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也将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发展维度以及目标之一,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尤其是数字营商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其中,智慧法院建设也是重要体现之一,完善智慧法院建设同时也意味着营商环境在法治化维度的进一步优化,这种优化不仅能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打造国际一流发展条件,还能破除制约消费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居民部门消费潜力。

本文综合既有研究,就数字营商环境、智慧法院与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具体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以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指标体系衡量数字营商环境水平,并用智慧法院建设对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行衡量,定量分析数字营商环境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影响作用,并探讨智慧法院建设在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对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领域的问题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数字经济产业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作为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重要环境,数字营商环境同样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进一步优化完善数字营商环境也是实现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在。

### (一) 营商环境与服务消费

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实践基础,各国对营商环境的界定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营商环境早期的权威解释衍生于200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sup>①</sup>近年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主流定义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营商环境具体所指代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处的外部环境状态,也是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各类要素的集合体<sup>[3-4]</sup>。二是营商环境具体体现为基于政府视角的确保企业部门规范、正常运营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影响各类市场参与者展开经济活动的制度性要素的集合<sup>[5-6]</sup>。

作为企业在开办、运营和注销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政治、法治和国际化等方面外部软环境的综合,营商环境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等众多领域的体系<sup>[7]</sup>,营商环境事关企业兴衰、生产要素流动、企业发展动能、消费环境和消费活力。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必经之路,2019年10月中国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首次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就优化营商环境作出要求与规范,在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这不仅强调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也为当前构建中国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体系贡献了法规依据。

① 在该报告中,营商环境被界定为伴随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和终结整个生命周期中涉及的政务、法治、市场和税务等外部环境综合体。

特别的是,服务消费的繁荣发展依赖一流营商环境。服务消费是服务性消费的简称,具体指人们为社会所提供的各类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服务支付的费用。服务消费的主要范围包括餐饮服务、衣着加工服务、家庭服务、医疗服务、交通通信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服务和其他服务八大类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提出,“积极发展服务消费”是“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的四项重要措施之一。国家对促进服务消费这一主题关注度逐年提升,这体现出服务消费提质升级是增进民生福祉、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也反映出了中国服务消费领域同样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sup>[8]</sup>。消费提质升级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最初表现为实物消费的提质升级,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三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发展到“新三件(冰箱、彩电、洗衣机)”,这是实物消费提质升级最典型的体现。“现代三大件(住房、汽车、X)”中的“X”可能是旅游、保险和子女教育等无形的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也意味着服务消费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关系,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可以显著拉动实物消费增长<sup>[9]</sup>,实物消费水平的提升也需要配备更为优质的服务消费内容<sup>[10]</sup>。促进服务消费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服务消费增长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更是发展服务经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结合持续深化,尤其是信息化时代以来,由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所推动的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进一步向高端价值链延伸,服务消费的重要性也逐年凸显。总体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往往意味着良好的消费环境。由于无固定场所、非实体性、对商业信誉依赖性较高等特征,服务消费对消费环境的要求更高,其繁荣发展依赖一流营商环境。实践表明,营商环境建设更为完善的城市往往也具备更为优化的消费结构。

## (二) 数字营商环境与服务消费提升

2020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数字营商环境”这一概念,强调要“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字经济潜力”。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数字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数字鸿沟加速弥合”等发展要求,同时也作出了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的重大部署。2023年2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指导、中国信息协会主办的中国首届数字营商环境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赋能营商环境创新”为主题,强调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sup>[11]</sup>。从概念界定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以企业的需求数据化、数据算法化、算法平台化、平台标准化为逻辑<sup>[12]</sup>。建设数字营商环境是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的耦合<sup>[13]</sup>。本文综合既有研究成果和国内外经验,认为数字营商环境是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普及化的产物,具有“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双重属性,是影响市场主体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外部环境的总和。其中,政务环境的数字化建设同样也会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智慧法院建设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体现。

数字营商环境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具备以下三种鲜明的特质,即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效率提升,数字化推动市场新业态生成与新行业崛起,以及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导向的制度建设转型<sup>[14]</sup>。建设科学、完善的数字营商环境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建设数字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智能化、政务服务在线化、数据运营无界化和平台信息交互化等路径实现<sup>[15]</sup>。服务消费由于具有无形特征,其对信息技术、大数据和数字营商环境的依赖性更高。打造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也可以避免消费者落入数字化需求陷阱<sup>[16]</sup>。当前,全球经济



格局变革加速,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为了进一步强化自身发展的竞争优势,中国应当迅速完善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新时代的数字营商环境,加速弥合数字发展鸿沟。数字营商环境助力拉动中国居民部门服务消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

第一,数字化平台所推行的经营评分体系可以有效规范服务质量。服务消费的数字化特征日益凸显,居民部门在支付服务消费时往往更依赖线上平台。众多服务类别中有一部分必须通过线下门店完成消费过程,如餐饮服务、医疗服务等相对固定的场所,通过线上平台的评分机制可以帮助消费者更为直观地认识商家提供的服务质量,从而降低交易的事前成本。由于提供服务消费的商家往往都面临着经营场所不固定、虚拟资产无抵押等问题,如中介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比一般性消费更依赖消费声誉,相对完善的数字营商环境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制度层面的保障,增加商家违约成本,降低交易的事中成本与事后成本。

第二,数字生态中的平台竞争有助于构建促进服务消费提升的良性机制。第三方平台本身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却可以成为促成多方供求关系的加速器与孵化床,各类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商家寻找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如近年来几大打车平台(如滴滴出行、高德打车和曹操出行等)通过不同的业态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但规范平台之间的良性竞争机制则对数字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平台内部的竞争会放大声誉价值在经营中的重要程度,有利于消费者降低交易的事前成本。对数字化平台而言,评分更高、商品质量更有保障、消费者回头率更高的商家往往会由算法驱动而得到更广的营销渠道和更大的曝光力度。

第三,数字营商环境下智能技术的应用会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信息技术为服务消费领域带来了高度智能化的机遇,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与应用也拓展了服务消费的供求双方的效率提升空间,产业数智化也会进一步带动家庭消费升级<sup>[17]</sup>。部分研究比较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对点评平台上的商家封面图片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认为相对于人类自身选择,人工智能系统所选择的商家封面图片对经营更加有利,平均可以提高12.34%—16.05%的用户参与度。在当前的数字营商环境下,商家所提供的宣传推销、定价、人员派遣、物流快递和研发等部分功能都由第三方平台承担,商家可以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对消费者而言,大数据算法下的服务消费的推荐会减少消费选择的时间和降低成本,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对接精准程度,这对双边市场而言都是一种效率优化。

第四,数字营商环境可以提高营商环境的透明度。数字营商环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优化政府办事效率,实现对市场主体的精准治理,以及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升级<sup>[18]</sup>。数字营商环境带来的透明度提高可以提升营商环境绩效,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政务服务平台和网站提供在线服务,第一时间发布政务信息、主动对市场主体进行回应<sup>[19]</sup>。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对多数跨国公司而言,决策者往往将契约密集度更高的生产环节投放于营商环境更优化、政务环境更透明、市场环境更具效率的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的契约密集度更高,对营商环境透明度的依赖性也会更高。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优质的政务环境,各类新兴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破除部门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壁垒<sup>[20]</sup>,可以节约制度性交易成本、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进而实现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拉动消费增长的目标。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会促进服务消费提升。

### (三) 智慧法院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服务消费提升

法治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智慧法院建设则是数字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运行的保障。“法者,治

之端也”, 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服务消费影响关系的研究也是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推动加快建设数字营商环境的进程中所涉及到的智慧法院建设, 同时也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路径。

营商环境与法治之间的结合构成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 其重点强调的是营商环境的法治化程度<sup>[21]</sup>。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强化在法律法规制度的约束下行使行政机关公权力, 并且行政机关的角色要完成从市场监管者向市场服务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转变<sup>[22]</sup>。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意味着行政机关执法规范, 真正保证公正执法, 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要让社会公众在整个司法程序中都能体会到法律的正义和公平, 同时各个市场参与主体也应当恪守诚信、严格守法、公平竞争<sup>[23]</sup>。

近年来, 中国在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性的制度建设和经验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消费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天然的依赖性, 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健康消费环境的保障, 也是维护消费者信心、刺激消费需求、拉动消费增长的基础所在。完善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有助于带动居民部门消费升级。对居民部门而言, 消费前所付出的信息搜寻成本、消费中所付出的价格协商成本和在完成交易之后付出的事后监督成本都可以因为营商环境的改善得到有效降低。以宁波为例, 宁波在强化营商环境的司法服务保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其首创了“局、队联合办案”机制, 进一步强化对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和关键生产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力度, 同时进一步为行政裁决案件创新性地开辟出了快速解决通道, 在20个工作日之内, 就可以完成专利侵权案件的行政裁决, 加快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进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可以增强生产者信心, 为打造更为良性、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提供强制性的制度保障, 也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交易成本, 从而刺激消费增长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此外, 优化营商环境还可以通过有效发挥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居民部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可以提升该地区对优质商贸企业的吸引力, 有利于建设适合商贸企业生存和经营的商业环境, 对居民部门的就业率、收入水平的提升产生拉动作用, 从而进一步加快消费提质升级<sup>[24]</sup>。

相对于实物消费, 服务消费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更高的依赖性, 服务消费的繁荣发展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居民部门为社会所提供的各种非实物性服务所支付的消费, 服务消费具有更高的可替代性和收入弹性。根据需求层次理论,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 服务消费在整体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服务消费的比重提升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之一。2022年, 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为10 590元, 相对于2013年, 其增长了5 344元, 增长率为101.89%, 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也由39.68%提升至43.16%。从城乡对比来看, 2022年, 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分别为13 723元和6 358元; 从区域对比来看, 2021年, 中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分别为9 285元、8 005元、6 760元和6 962元, 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从国际来看, 2021年, 中国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16%, 同年美国和墨西哥分别为44.30%和27.40%。这种差异性并不完全是由居民收入差距导致的<sup>[10]</sup>, 营商环境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往往更有利于服务消费的繁荣发展。

当前服务消费的发展普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如服务消费内容标准化欠缺、质量难以界定。服务消费的产品一般是不可以从实体上被感知到的, 即便是同一种服务由同一个人提供, 也会因为接受服务的个体的不同而回馈不同的服务感受, 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时间和约束条件下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也可能有所差异。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评价也并不是由服务结果完全决定的,

如月嫂、育儿嫂、老人护理和残疾人护理等家政服务，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不同的行为习惯、传统差异、知识认知和个性化都会引起服务质量感知的差异。这类服务消费市场也是最容易引发买卖双方纠纷的市场之一，而相对完善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则会为事前识别、交易过程和化解纠纷等提供保障，如通过线上平台所建立的强制性规范可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合规性，可以在产生交易矛盾时有效化解冲突、减少福利损耗，也可以加强对服务供给方的资格审查力度。以河南智慧法院建设为例，河南开通的“河南网上庭审”小程序，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之后，可以将证据交换、法庭辩论等环节放在线上进行，以“信息跑”代替“群众跑”，解决异地审案的难题，减少了案情处理时间，更好地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数字正义”的便利，对消费环境下的纠纷处理、制度维护等起到了良性的助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数字营商环境通过智慧法院建设促进服务消费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西藏除外）为样本（下文简称为“各省”）。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官网。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部门服务消费（CS）。当前，国内研究多采用消费支出规模对居民部门的整体消费情况进行衡量<sup>[25]</sup>。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服务消费一般涵盖了居民部门用于餐饮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医疗服务等各种生活服务的消费支出，整体消费支出是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总和。本文选取居民部门用于服务消费的支出规模衡量服务消费<sup>[26]</sup>，并取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digital）。在对数字营商环境进行衡量时，有研究用数字政府建设的虚拟变量作为数字营商环境的替代变量<sup>[27]</sup>。本文参考靳豆豆<sup>[28]</sup>的研究，构建中国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得分。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符 号 | 基础指标                         |
|-----------|--------|-----|------------------------------|
| 基建环境数字化水平 | 通讯设施   | A1  |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           |        | A2  | 移动电话基站                       |
|           | 计算机使用  | A3  |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
|           | 互联网端口  | A4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
|           | IPv6应用 | A5  | IPv6综合应用指数                   |
|           | 移动电话普及 | A6  | 移动电话普及率                      |
| 金融环境数字化水平 | 金融发展   | B1  | 各省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
|           | 金融监管   | B2  | 各省金融监管指标（地方金融监管支出/金融业增加值）    |
|           | 金融科技   | B3  | 各省金融科技水平（基于百度指数构建而来）         |
| 市场环境数字化水平 | 电子商务销售 | C1  | 电子商务销售额的自然对数                 |



由表1可知，指标体系从基建环境数字化水平、金融环境数字化水平、市场环境数字化水平三个角度对各省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进行衡量，所涉及到的10个基础指标是可以从结果端或制度供给端对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有所反映的指标。其中，指标A1—A6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衡量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客观基础，指标B1—B3从金融领域发展的结果端衡量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成效，指标C1从电子商务角度衡量数字营商环境的外在表现方式。

3.机制变量

为了检验数字营商环境通过智慧法院建设从而拉动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智慧法院建设（law）作为机制变量。对法治化营商环境而言，当前国内各省市营商环境评估报告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和《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等<sup>[29]</sup>，然而囿于时间范围和评价体系的接受程度，数据的可用程度不高。从具体概念界定和既有研究来看，以智慧法院的建设情况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替代变量，探讨数字营商环境对服务消费的影响机制<sup>[30]</sup>具有一定可信度。作为信息化时代进一步强化法治化建设的产物，智慧法院以现代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原则，坚持司法规律、体制改革与技术变革相融合，以高度信息化方式支持司法审判、诉讼服务和司法管理，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机制。2017年年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3.0版，网络化、智能化、阳光化三位一体的智慧法院格局由此落成<sup>[31]</sup>。在不同的地区中智慧法院的建设进度也不同，目前北京、广州、杭州已经成立了互联网法院，开通了互联网审判职能，在智慧法院的建设进程中更进一步。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设立首家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又在北京、广州相继成立两家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法院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新篇章，也标志着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具体地，以各省省会城市设立智慧法院的虚拟变量衡量智慧法院的建设，以广州为例，2017年互联网法院未设立时，广东的智慧法院建设变量取0，2018年以及此后年份该变量取1。

4.控制变量

综合现有的关于营商环境与消费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develop）<sup>[32]</sup>、居民收入水平（income）、失业率（unemployed）<sup>[33]</sup>、经济开放程度（open）<sup>[34]</sup>、产业结构（structure）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develop）用各省人均GDP衡量，并取自然对数；居民收入水平（income）用各省居民年均收入衡量，并取自然对数；失业率（unemployed）用各省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经济开放程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structure）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衡量。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 量        | 样本量 | 均 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CS         | 360 | 8 896. 6720  | 2 659. 6230  | 4 245. 7600  | 18 894. 1000  |
| digital    | 360 | 0. 0957      | 1. 5053      | -1. 8659     | 6. 1159       |
| law        | 360 | 0. 3944      | 0. 4894      | 0            | 1             |
| develop    | 360 | 58 718. 5100 | 30 660. 6600 | 16 024. 0000 | 190 313. 0000 |
| income     | 360 | 25 609. 2400 | 12 554. 6800 | 8 463. 0000  | 79 610. 0000  |
| unemployed | 360 | 3. 2436      | 0. 6429      | 1. 2000      | 4. 6000       |
| open       | 360 | 0. 0419      | 0. 0438      | 0. 0011      | 0. 2266       |
| structure  | 360 | 1. 3536      | 0. 7446      | 0. 5271      | 5. 2829       |

（三）模型设定

为了对前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CS_{it} = \alpha + \beta_0 digital_{it} + \beta_1 develop_{it} + \beta_2 income_{it} + \beta_3 unemployed_{it} + \beta_4 open_{it} + \beta_5 structure_{it} + \gamma_i + \delta_t + \mu_{it} \tag{1}$$

$$law_{it} = \alpha' + \theta_0 digital_{it} + \theta_1 develop_{it} + \theta_2 income_{it} + \theta_3 unemployed_{it} + \theta_4 open_{it} + \theta_5 structure_{it} + \gamma_i + \delta_t + \mu_{it} \tag{2}$$

其中，以模型（1）探讨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影响，同时进一步以模型（2）探讨以智慧法院为机制变量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在以上模型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β<sub>0</sub>为本文所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的系数，α为常数项，γ<sub>i</sub>和δ<sub>t</sub>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sub>it</sub>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影响结果

|                | (1)                | (2)                |
|----------------|--------------------|--------------------|
| digital        | 0.0824*** (0.0154) | 0.0391*** (0.0140) |
| develop        |                    | -0.1295 (0.1234)   |
| income         |                    | 1.0175*** (0.1850) |
| unemployed     |                    | -0.0171 (0.0149)   |
| open           |                    | 1.4229** (0.5872)  |
| structure      |                    | 0.0839* (0.0469)   |
| 常数项            | 8.3763*** (0.0373) | -0.2807 (1.8843)   |
| 地区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R <sup>2</sup> | 0.7787             | 0.9197             |
| 样本量            | 360                | 360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由表3可知，提高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可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其回归系数的大小、正负、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进一步说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可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也是推动整体营商环境完善的必经之路，这种基于线上服务平台、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性创新与进步，可以为居民消费行为尤其是居民部门服务消费提供良性的消费环境和消费保障，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尤其是服务消费增长。不仅如此，在经济下行、消费萎缩的时代，完善的数字营商环境也会成为缓解居民部门进一步缩减消费规模的保障，也是刺激消费恢复的基础所在。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相关理论和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省份往往经济更为发达，从而也意味着较高的消费水平、更丰富的服务消费供给和更高的居民服务消费能力。同时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省份也往往意味着城镇化率领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消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理论上



来看，城市生产具有集聚效应，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不仅仅可以促进个人产出提升，还可以强化生产的集聚效应，促进整体产出增加并反映为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经济开放程度而言，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的各省开放程度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刻画贸易自由度和生产要素流通效率，并且也会反映贸易的繁荣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消费市场的繁荣程度也会较高，这对进一步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具有促进作用。另外，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有效促进服务消费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通过产业的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可以有效改善供给、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从而可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刺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sup>[35]</sup>。根据经验分析，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可能伴随着较高的服务消费支出，然而基准回归中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却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所选取样本时间范围的局限性有关，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决定消费结构的特征，如在一人均GDP的维度上浙江略逊于天津，然而服务消费支出规模却远高于后者，服务消费支出也会受到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对失业率而言，低失业率是经济强劲最典型的标志之一，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居民失去了收入来源，从而不得不缩减消费支出，也是经济下行的标志，然而从回归结果来看，失业率与服务消费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以服务消费占比（服务消费规模占总消费规模的比重，以SE表示）衡量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1)                | (2)                |
|----------------|--------------------|--------------------|
| digital        | 0.0380*** (0.0064) | 0.0163*** (0.0052) |
| develop        |                    | -0.0493 (0.0458)   |
| income         |                    | 0.1335** (0.0593)  |
| unemployed     |                    | -0.0037 (0.0035)   |
| open           |                    | 0.8359*** (0.1827) |
| structure      |                    | 0.0071 (0.0154)    |
| 常数项            | 0.3222*** (0.0132) | -0.4612 (0.5274)   |
| 地区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R <sup>2</sup> | 0.3091             | 0.6145             |
| 样本量            | 360                | 360                |

由表4可知，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促进作用再次得到验证，不仅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大小、显著性水平未受到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从结构视角出发的回归分析更加证明了结论的准确性，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会促进居民部门服务消费支出规模扩大，还会提高消费结构中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因而不断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是刺激服务消费增长、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促进消费恢复的重要路径。

（三）异质性分析

按照现行标准，本文把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                | (1)                | (2)                | (3)              |
|----------------|--------------------|--------------------|------------------|
|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 digital        | 0.0576*** (0.0213) | 0.0082 (0.0605)    | 0.0445 (0.0503)  |
| develop        | -0.3595 (0.2831)   | 0.2496 (0.2315)    | -0.0771 (0.4022) |
| income         | 0.6531 (0.6142)    | -0.1588 (0.3872)   | 1.1691* (0.6362) |
| unemployed     | -0.0938 (0.0678)   | -0.0280* (0.0149)  | 0.0470 (2.6056)  |
| open           | 0.3796 (1.5661)    | -3.4998* (1.8856)  | 0.7144 (2.6056)  |
| structure      | -0.0554 (0.1257)   | 0.2102*** (0.0801) | -0.1244 (0.2826) |
| 常数项            | 6.8738 (7.4247)    | 7.5068** (3.6382)  | -2.2132 (4.4357) |
| 地区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R <sup>2</sup> | 0.7426             | 0.9095             | 0.8607           |
| 样本量            | 132                | 120                | 108              |

由表5可知，在东部地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则并不显著，说明中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服务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领跑地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相对更为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遥遥领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全面，并且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庞大、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消费潜力更大，在这种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基础设施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前提下，东部地区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囿于消费市场、基础设施、人口购买力和基本制度等制约，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促进作用还未得到完全体现。当前，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的必经之路，在东部地区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数字营商环境从而发挥拉动服务消费增长的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应当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市场建设，为服务消费的发展打造更为完善的环境。

（四）机制分析

对传统营商环境的概念界定一般涉及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加强数字化应用。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智慧法院建设作为数字营商环境影响居民部门服务消费的一个机制变量进行研究，机制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机制分析结果

|            | law                  |                | law                   |
|------------|----------------------|----------------|-----------------------|
| digital    | 0.6167*** (0.1896)   | 常数项            | -60.1779*** (10.4108) |
| law        |                      | 地区固定效应         |                       |
| develop    | 0.2806 (0.8410)      | 时间固定效应         |                       |
| income     | 5.5243*** (1.5281)   | Prob > chi2    | 0.0000                |
| open       | -42.9428*** (6.9501) | R <sup>2</sup> | 0.5982                |
| unemployed | 0.0866 (0.1994)      | 样本量            | 360                   |
| structure  | 0.1249 (0.2326)      |                |                       |

由表6可知，数字营商环境对智慧法院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法院建设是对营商环境在数字化方面的进一步完善。通过运用智慧法院进行的线上案件受理可以大大节约办案时间，

提升审案效率,为更好地处理消费环境下的各类纠纷以及保障交易公平性提供良好助力。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普遍具有场所不固定并且具有无抵押性等特点,其对于消费市场环境的依赖度也会更高。智慧法院建设所带来的“数字正义”深化为服务消费的交易双方提供了保障,从而可以对服务消费起到有效的提振作用。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与服务消费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智慧法院建设在其中的机制作用。根据分析结果,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会对中国服务消费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提升也会通过促进智慧法院建设从而作用到服务消费。从异质性检验来看,东部地区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对服务消费所发挥出的提振作用更为显著。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服务消费交易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方可得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一是完善中国相关政策法规。当前,中国相关的政策法规还有一些不足,如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不够高,一些领域存在垄断行为;服务业管理与治理的措施比较粗糙、政策落实不到位等。二是按照“非禁即准”原则,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市场主体,均可以逐步向社会开放,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推动服务消费升级,并鼓励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新业态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载体,树立服务消费新标杆。

第二,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持数字化赋能。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消费占比上升,但中国服务业企业的数字意识和数字化基础仍较薄弱,因而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智慧法院的作用。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和互联网司法工作,推动优化司法诉讼模式,建立开放、动态、透明的司法服务,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机制。二是健全数字治理的法律体系,提升数字化服务的法制水平。加快出台数据产权保护、流通交易等方面的相关制度,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通和创新应用。完善促进数字平台和数字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消除垄断和市场壁垒,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保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提高数字化发展的安全水平。三是加强数字化监管水平。强化智慧监管,依托网络交易监管平台,建立网络经营主体信用库,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信用等级调整检查频次,运用技术手段常态化开展网络交易监测。

第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消费恢复和升级。应当进一步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提升居民部门消费增长、恢复消费信心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服务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当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服务消费特定场景的保障作用,如对网上信贷等涉及重要资金流动的交易过程的安全性保障,以及对特定消费行为的交易的规范性引导。对一些契约密集度相对较高的服务消费行为而言,要逐渐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影响力度,促进信息透明化,降低交易的事前成本,加大法治化实施力度,增加违约成本,维护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并进一步健全规则体系、提高交易效率,增进整体福利水平,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1).
- [2] 王鹏,邢璇,汤笑添.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提升数字营商环境[J].数字经济,2023(Z2):9-13.



- [3]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李志军,张世国,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管理世界,2021,37(5):98-112+8.
- [4] 郑国楠,刘诚.营商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J].财经问题研究,2021(2):3-12.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何德旭.优化营商环境与扩大国内需求[J].财贸经济,2023,44(8):5-21.
- [6] 刘健,刘曦萌,白东北.营商环境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J].财贸研究,2023,34(7):29-39.
- [7] 宋林霖,何成祥.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4):67-72.
- [8] 彭泗清.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增长:难点与对策[J].国家治理,2023(4):43-47.
- [9] 毛中根.服务消费发展:现状、比较及建议[J].人民论坛,2023(18):40-45.
- [10] 毛中根,王鹏帆.中国消费政策演进历程、逻辑和取向[J].改革,2023(8):54-65.
- [11] 刘欢.江苏省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23(12):17-19.
- [12] 张德森,李林芳.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6):98-105.
- [13] 赵红梅,王文华.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J].统计与决策,2022,38(23):28-33.
- [14] 潘思蔚,徐越倩.数字营商环境及其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2022(11):73-79+72+157-158.
- [15] 周伟.数据赋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J].求实,2022(4):30-42+110.
- [16] 黄少安.谨防数字化经济陷阱[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5):40-46.
- [17] 张梦霞,黄凯祥.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J].财经问题研究,2023(3):45-56.
- [18] 孙源,章昌平,商容轩,等.数字营商环境:从世界银行评价标准到中国方案[J].学海,2021(4):151-159.
- [19] 郑烨,王春萍,段永彪.“放管服”改革、政府透明度与区域营商环境——基于国内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20,34(9):9-15.
- [20] 王昌林,赵栩.加快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关于当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9(7):19-20.
- [21] 李建伟.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营商环境法治观[J].法学论坛,2022,37(3):21-32.
- [22] 谭国威.互联网背景下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设[J].中国市场,2023(31):190-194.
- [23] 郑方辉,王正,魏红征.营商法治环境指数:评价体系与广东实证[J].广东社会科学,2019(5):214-223+256.
- [24]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8):71-86.
- [25] 刘健,刘曦萌.优化营商环境会促进居民消费吗?——基于国内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5):140-147.
- [26] 汤莉,陈康荣.平台经济、智慧流通与服务消费——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商业经济研究,2023(17):117-120.
- [27] 张杰,李玉波.数字政府建设能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现代管理科学,2023(5):70-80.
- [28] 靳豆豆.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3(21):18-21.
- [29] 高远,刘泉红.营商环境能否影响企业创新[J].经济与管理,2023,37(6):85-91.
- [30] 谢珍贞,李进.西部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与优化对策研究[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3(2):71-80.
- [31] 欧丹,胡锦涛.智慧法院建设评价体系的重塑[J].法治论坛,2023(1):314-324.
- [32] 向国成,石校菲,邝劲松.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吗?[J].消费经济,2021,37(5):44-55.
- [33] 赵达,沈煌南,张军.失业率波动对就业者家庭消费和配偶劳动供给的冲击[J].中国工业经济,2019(2):99-116.
- [34] 蔡婕萍,曾晓华,张梦洮.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基于贸易开放和市场开放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2023(15):130-134.
- [35] 王芳,黄莉芳.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11):144-150.

##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mart Courts and Service Consumption

SONG Yu-ru, LIU Cheng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Summary:** In the face of downward economic pressure, how to boost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ert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of countries.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optim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of all countr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global trade competitiveness by optimizing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laws. The rule of law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the guarantee of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siness enviro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the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involv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ir impac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is even rarer.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of the resident sector by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It further introduces the smart court index and the effect of smart court construction on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condu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optimizing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significantly drive service consump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In addition, smart court construction exerts an obvious transmission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namely that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facilitate smart court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further boost service consumption. Therefore, optimizing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smart court construction are not only the paths we must take to optimize the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also important ways to boost service consumption in the residential sector.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made certain expansion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onsumption,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gital ag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In addi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mart court, empirical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hich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lement more targe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etter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mart court; service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尚培培)